



名人书信掇英

弗洛伊德与莎乐美 通信集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俄]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著

韩笑 译



Lou Andreas-S

名人书信掇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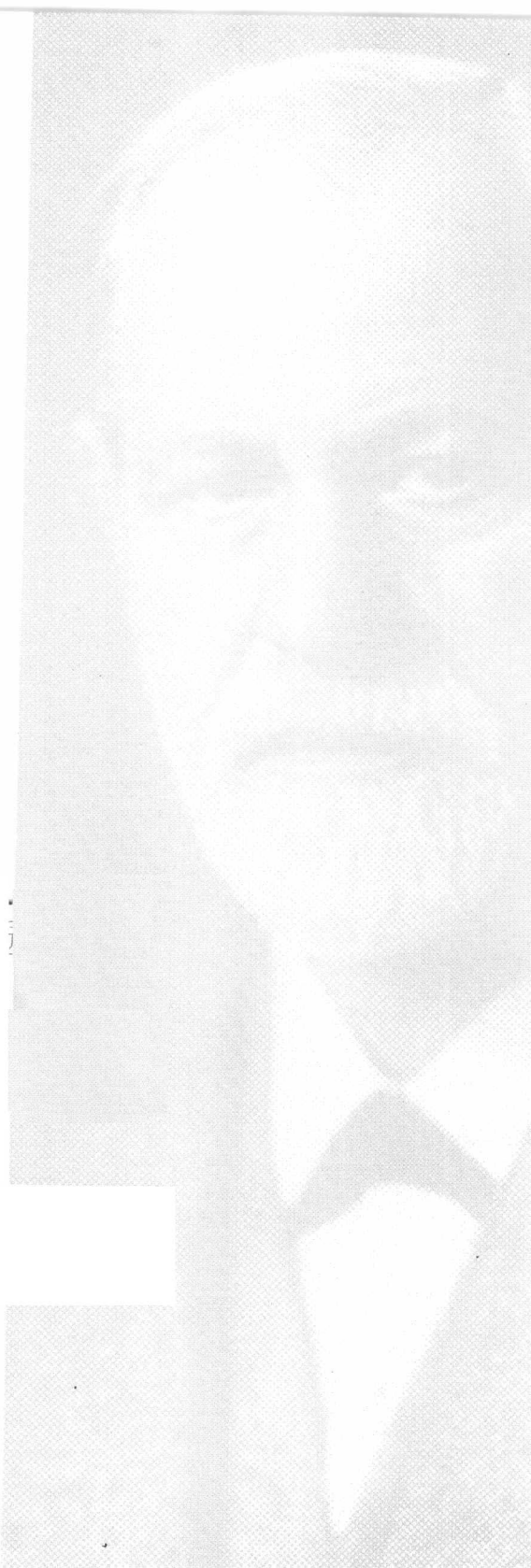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与莎乐美 通信集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俄]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著

韩笑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洛伊德与莎乐美通信集 / (奥) 弗洛伊德 (Freud, S.), (俄罗斯) 莎乐美著; 韩笑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12

(时代学术经典, 传记名著)

ISBN 978-7-212-06019-0

I. ①弗… II. ①弗…②莎…③韩… III. ①弗洛伊德, S. (1856 ~ 1939) —书信集
②莎乐美, A. (1861 ~ 1937) —书信集 IV. ①K835.215.1 ②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9415 号

弗洛伊德与莎乐美通信集

作 者 |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俄]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译 者 | 韩 笑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张晓辉

责任编辑 | 宋 春 王 斌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编辑 | 赵秀彦

装帧设计 | 未 氓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电话: 010-8959733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695×995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242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6019-0

定 价 |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生平简介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于1861年2月12日出生于圣彼得堡，是家中的独女，也是六个孩子中的老幺。其父是一位胡格诺派俄罗斯将军，祖辈来自于德国波罗的海沿岸。而她的母亲来自德国北部，再往上追溯，还有丹麦血统。在路易斯·冯·莎乐美的家庭中，“德语是绝对的第一母语”，正如她自己所陈述的那样；然后是法语，之后才是俄语——“而在那时候，俄语主要是平民所使用的语言”。十九岁时，在其家庭教师亨德里克·吉列特的安排下，她进入了苏黎世大学，学习哲学和宗教历史，并借此踏入了西欧学术界。

一年之后，她的学业因为一场疾病而被迫中断。在某些重要的事件之后^①，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从1883年至1903年这二十年的时间中，一直居住在柏林，之后，又搬到了哥廷根，在那里生活了半辈子，一直到她1937年2月5日去世。从柏林和哥廷根，她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而且“至少每十八个月”她都要去圣彼得堡看望她的亲戚，最后一次是在1911年。

在她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出现过三位伟人。在他们名字的光芒或是阴影下，她在当时的学术历史中取得了一席之地。这三位伟人就是尼采、里尔克和弗洛伊德，他们分别在毫不相同的领域有所建树，而她与这年龄差距极大的三人都私交甚笃。（尼采出生于1844年，弗洛伊德1856年，里尔克1875年。）

在她的第一本小说《为了上帝的斗争》(Im Kampf um Gott) 出版后，

① 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尼采在嫉妒心的驱使下，使用恶毒的言语中伤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迫使她与尼采兄妹绝交。

她便开始作为一位批评家而日渐成名。在她一本关于易卜生作品中女性角色的书中《易卜生笔下的女性形象》(Ibsens Frauengestalten, 1892), 她将这些角色看做是活生生的人。她于 1882 年春夏结识了尼采, 并由此创作了《弗雷德里希·尼采与其作品》(1894 年), 书中她以客观的视角介绍了他的性格、发展以及理论体系。此书一出, 便招来了尼采妹妹的怨恨: 出于纯粹的个人原因, 他的妹妹企图宣称,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手中的尼采照片是伪造的。而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从未对这些攻击做出过任何回应。1915 年瑞士作家 C.A. 伯努利的一篇文稿, 才第一次将伊丽莎白·尼采的目的和作为公之于众^①。有关尼采的这本书甫一问世,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就赢得了心理学小说家兼随笔作家的名声 (1901 年 5 月), 也使后世的我们得以评价她对当时的文学写作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尤其是《数年间》(Im Zwischenland, 1902) 一书中五篇关于青春期少女心理的故事, 确立了她作为一名拥有敏锐心理学视角的创作型作家的地位。

里尔克曾于 1905 年将他的《时之书》(Book of Hours) 一书, 题记赠予她: “交于露之手”。他出版的书信和早期的日记都揭示了她对于他的重要意义——无论是作为一个男人, 还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在他去世后, 她立刻写了一本书《赖内·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这更宣告了他在她心中的重要意义。但在她去世后出版的遗作《回顾我的一生》(Lebensrückblick, 1951) 中, 才首次清楚地表明这段萌生于她生命第一阶段的友谊的根本性质。

她的随笔文稿《感谢弗洛伊德》(Mein Dank an Freud) 创作于 1931 年, 也就是后者七十五岁的生日之时。这份文稿是她生命中下一阶段的见证。但是, 他们在精神分析学上所取得的成就, 并不仅仅归功于她在心理学方面的造诣和深刻的理解力, 还应包括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所表现出的创造性, 将

① 卡尔·阿尔博瑞特·伯努利的作品《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和弗雷德里希·尼采》。

同样的内心目的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在其杜撰出的一个故事中，魔鬼回到了他原始母亲的身边。[《魔鬼和他的祖母》(Der Teufel und seine Grossmutter, 1922)]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这三部作品，足以揭示她和尼采、里尔克以及弗洛伊德三人关系的本质：关于尼采的这本书，基本上是调查发掘性质的；里尔克的这本（最初冠名为《赖内》）基本上是一本私人回忆录；而有关弗洛伊德的书则是为了表达感激之心，报答他给予她的种种。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曾这样解释其“对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产生如此特别的共鸣”的原因：首先，“目睹了一个世间罕有、非比寻常的伟人的命运”——这个伟人就是里尔克——莎乐美见证了他艺术生涯的发展历程和精神世界的蜕变。其次，“我在俄罗斯长大，那里的人民内心是极为消极被动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基于一种更深层的反应或心理准备。若想充分理解，就不仅要了解她这三次伟大的邂逅，更要不带任何主观臆断地追根溯源，纵观其一生的轨迹。只有这样，才能领悟三位伟人对她的深刻意义。

要知道，对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一生产生巨大意义的人物并不只有尼采、里尔克和弗洛伊德，还有另外三位鲜有人知的人物，那就是圣彼得堡的牧师亨德里克·加略特；尼采的旧友、犹太裔实证主义哲学家保罗·李；以及哥廷根东方语言学教授 F.C. 安德烈亚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位——加略特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他是一位神职人员；同样，李的角色也不是一位哲学家。而第三位，也就是与她结婚的安德烈亚斯，从未担任过世俗意义中“丈夫”的角色。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创作《回顾我的一生》一书时，极力避免将其设定为一本自传。其中，她从自己的记忆长河中，将那些决定了她生命轨迹的经历加以整理。这些经历中的第一部分被她冠以《上帝的体验》一题。而这段童年时期的经历，在她的回顾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是她人生中至

关重要的一笔。

上帝的体验——年幼的露易丝·冯·莎乐美虔诚地信奉上帝。但在她需要的时候，上帝并未回应她的祷告，这让她觉得自己被上帝抛弃了。这种感觉不仅笼罩了她的童年，还伴随了她的一生。但在她看来，世间凡人都被上帝抛弃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这一经历影响着她的一生：被上帝遗弃的感觉，让她与世间存在的万物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我们可以说，童年时期，她对上帝的敬畏转化成了对“所有自然现象”的敬畏；尽管这些现象何其微小，在她看来却都有着神圣的因由。

这就是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生命第一阶段的主题，直到十六岁时，她第一次见到亨德里克·加略特，这个比她年长二十五岁的男人。就是这个男人，将她从“孤独的幻想”中拯救出来，因为她不仅爱上了他，而且在自己的心目中将他奉为“圣人”。她心中的热忱和信任不再献给上帝，而是转向了一个凡人。而这也赋予了加略特权力，将她一直以来埋藏的天赋激发出来，引导她走上了学术道路。直到这时，露易丝·冯·莎乐美才更名为露——他对她的昵称。但加略特这个圣人，和她童年时的上帝有着相同的命运。当他向她求婚，以求“将天堂带到人世间”时，在她眼中，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在这两个命运般的阶段后，露的生活进入了一段相对较为平静的时期，而出现在这段时期的主要人物就是保罗·李。和加略特分开后，露·冯·莎乐美患上了肺出血。在一段短暂而紧张的学习之后，她被母亲带到了罗马。1882年春，在玛毕达·冯·莫森布的社交圈中，她结识了年长她十二岁的李。正如她在圣彼得堡对加略特一见钟情，她再次听到了命运的钟声，只不过这次她万分确定要将两人的关系维持在友谊的界限内，并且坚持这一信念绝不动摇。及至晚年，她仍旧宣称她是绝不会主动与李断交的。对她而言，他的离开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她与尼采的相识也是在罗马。她引发了这位伟人追求个人幸福的希望。而对露来说，这次邂逅仅是两人学术之路的交汇。在之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

柏林的学者们聚集在李和她身边，频繁举办学术活动。这段时间中，他们对这种关系十分满足。

“正如路面上的一块石头可能导致一辆全速前进的马车翻覆”，露就是这样描述她和李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的终结。事件的导火索就是她与 F.C. 安德烈亚斯的相识。她曾有过众多的追求者，但从来不为所动。但这次，她无法抗拒他的性格魅力。在她和安德烈亚斯结婚一年半之后，也就是 1888 年 10 月，她的一篇日记透露出加略特的那段往事以及她的信仰经历在她心中留下了后遗症。她将婚姻和“肉欲之爱”区分开，并且认为后者根本不是婚姻的基础。“婚姻是伴侣彼此认定相属。若是用带有宗教意义的话来说，就是婚姻不再是一个凡人对另一个凡人（加略特）卑躬屈膝，而是两个凡人并肩跪拜。”因此，她还是无法接受肉体上的结合。对于保罗·李，她无法将“这一步的真相”透露给他，此时此刻，又是她“最迫切需要他的时候”，但他却无法接受这个局面，而选择离开，消失在她的生活中。

五年之后，婚姻触礁。“至此为止，可以证明凡人是无法延续这种关系的。”她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旅行。在巴黎，她认识了汉姆生^①、赫曼·邦^②，还有弗兰克·魏德金。在维也纳（1895 年—1896 年），她通过施尼茨勒的圈子，结识了理查德·比尔-霍夫曼和霍夫曼斯塔尔，又和玛丽·冯厄本那-埃施巴士住了一段时间。在柏林，她已经认识了斯大林伯格和豪普特曼兄弟。她和吉尔哈特·豪普特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凭借她所创作的尼采相关作品和有关加略特的小说《悲悯》（1895 年），她已经跻身一流女作家的行列。

露的生命的下一阶段主要由赖内·玛利亚·里尔克主导。她和里尔克于 1897 年 5 月在慕尼黑相识。“之前的冲突和压力可能影响了我，让我在更加平和的氛围中体会爱情。”同样，里尔克并不是以诗人的身份打动了她，而是他自身带有的那种“冷漠善感的气质”吸引了她。但这段感情也遵循着特

① 挪威作家，于 192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丹麦作家。

定的命运。在他们去往俄罗斯的旅途中（1900年），里尔克这个艺术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男人。露成为了他的伴侣，两人的关系保持了很久。

我们可以推测，在这段旅行之后，她有了一段更为富有激情的经历。这可以从她于1901年2月26日对里尔克《最后的恳求》以及弗洛伊德在她讣闻上的评论中得出：那时，在维也纳“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命运得到了圆满”。这种牵绊持续了几年，但在她心底，暗暗为这个与她相伴游历的伙伴感到羞耻，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耻。对露来说，厄洛斯（也就是爱神丘比特）的经历是不会永存的，只是短时间完美的结合。但在她心中，仍然对这个“有能力激发信仰和爱的男人”怀有感激之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两段经历在冥冥之中影响了她的一生。

1903年，F.C. 安德烈亚斯被派到哥廷根大学任教。她在日记中写道：“离开了我那土地广袤的家乡（俄罗斯），搬到了这个小家”。在她与里尔克的俄罗斯之行后，她曾说过“俄罗斯终于属于我一个人了”，并且创作出了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回忆俄罗斯》（Ródinka）（1923年首次出版）。1906年，她几次造访柏林，观看马克斯·雷恩哈特的作品，特别是吉尔哈特·豪普特曼的戏剧。那时，她还有机会认识了雷恩哈特的演员们。1909年，在马丁·布伯的鼓励下，她创作了专论《成年人》（Die Erotik）。

露与其丈夫的关系始终未生隔阂。在她遇到里尔克之后，“静默笼罩在我们之间，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而绝不可将其看做是两人对婚姻关系的妥协。在《回顾我的一生》一书关于F.C. 安德烈亚斯的一个章节的题记中，她对自己发出了这样的质疑：是否“在两人的关系方面，他一直以来都大错特错了？”

露一生中最后阶段的主导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再或者说，就是没有特定姓名的“全人类”（der Mensch）。在她的《回顾我的一生》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她将这个阶段称为“弗洛伊德经历”（Das Erlebnis Freud），与她童年时期的特殊“经历”刚好首尾呼应。除了《感谢弗洛伊德》一书外，这里所呈现给大家的所有信件就是对这段深

厚情谊的最有力的证明。在回顾一生的作品时，她曾说过，现在这种感觉就好像“在开凿一条隧道的过程中，与自己面对面地相遇”。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弗洛伊德帮助她“在我们基本的信仰上添加了新的东西”。

恩斯特·菲佛

哥廷根，“露菲尔德庄园”

9月27日，1912年

尊敬的教授：

自从去年秋天参加了魏玛会议之后，精神分析学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对这个领域了解得越多，就越着迷。而现在，我的维也纳之行即将实现^①，我想和您见见面，听听您的课，参加您在星期三晚间组织的讨论会，望您允许。此次出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要把我的全部都贡献给精神分析学。

您忠诚的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1912年至1913年间学习精神分析时，完成了日记《在弗洛伊德学校》(In der Schule bei Freud)。从其中的后记来看，她初次和弗洛伊德相识，很可能不像人们从她的自传作品《回顾我的一生》所推测的那样，发生在于1911年9月21日召开的魏玛精神分析学大会，而是比这早十五年的1895年春。

1951年《回顾我的一生》现世后，露西亚·莫拉维茨首先向编辑指出了这一点。在这部作品中有这样一句话：“1911年秋，魏玛精神分析学大会上，我就站在弗洛伊德的前边。”对此，露西亚·莫拉维茨说：“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1911年才第一次见到弗洛伊德？但我记得很清楚，1895年春天，我和她在维也纳有过一段交谈，后来因为她约见了弗洛伊德，必须要离开中断。我仍然记得她当时所说的每个字和语气。”

这里有没有可能出现误解，让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次拜访是否真实，或者这次拜访的意图是什么？1895年春，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再次来到维也纳”并在此停留，这是她在和阿瑟·施尼茨勒的通信中的原话。她很快就结识了理查德·比尔-霍夫曼、雨果·冯·霍夫曼塔尔和其他一些人。据露西亚·莫拉维茨自己说，她是“霍夫曼塔尔、巴赫尔、卡尔·克劳斯和埃克斯特恩圈子的外国成员”。所以这些圈子都有交集。而在1895年5月中旬，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维也纳停留期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罗伊尔合作完成的《歇斯底里症研究》出版问世；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章中，弗洛伊德阐述了歇斯底里的精神疗法。在之前和保罗·李以及她的朋友芙蕾达·费恩·冯·布罗（也是她维也纳之行的同伴）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经历之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被这

10月1日，1912年

维也纳IX，波加斯19号

尊敬的安德烈亚斯夫人：

等您到维也纳的时候，我们将竭尽所能将已经得到证明认可的精神分

本书的主题及其对这一问题崭新的见解深深地吸引住了。也许有人将她的注意力引向了弗洛伊德。这个人可能就是阿瑟·施尼茨勒；当时相比于其他人，他和露的关系较近，同时也是一位专业医生。早在1887年，他就为了一本关于吗啡成瘾的书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在这本书中有一段话来源于弗洛伊德所著的关于可卡因成瘾的文章，他“和弗洛伊德发起了讨论”（E. 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104）。他可能知道弗洛伊德的其他作品，偶尔听过他的讲座。不管怎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他意义深远，无论是从整体来说，还是在他创造工作中对自己见解的认可上。而从弗洛伊德这方面来说，就像他于1906年写给施尼茨勒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早在多年以前，我就意识到我们在很多心理学以及性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深刻见解”。

但是，只有初次拜访真正实现的情况下，这段陈述或是猜测才会有真正意义。这会不会就是导致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和赖内·玛利亚·里尔克有了同样伤心的经历后，如此热忱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精神分析学发现的原因？她是否也因此收到邀请，以客人身份参加魏玛大会？“魏玛大会上，我就站在弗洛伊德前面”：她的这句话是否意味着这就是他们的初次会面？

在决定性的第二次会议上，她不再是和那位神经学专家一起出席，而是和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明显是通过一位共同关系人的引荐。

1911年8月末，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造访了她的朋友——一位瑞典慈善家艾伦·凯伊，她的家位于瑞典的阿尔瓦斯特拉，在那里，露结识了斯德哥尔摩神经学专家保尔·贝瑞医生。贝瑞已经读过了弗洛伊德的所有作品。根据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日记，当时他正为一门有关“升华”的讲座做准备。日记中还记录了许多次“晨间或晚间的科学交流”。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于1921年至1923年9月同贝瑞一起来到魏玛，参加了大会。

日记的记录清楚地表明，她完全没有依靠贝瑞，立即就被接纳，成为弗洛伊德组织最核心的成员之一。她的《弗洛伊德日记》中详细记叙了她和贝瑞的关系。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于1911年12月在哥廷根写的一篇日记，体现出她对精神分析学产生了更加深刻、更加浓厚的兴趣：“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始终不减，越来越敬仰弗洛伊德的坚定执着。相比于和贝瑞在一起时，我现在理解得

析理论介绍传授给您。我想，有您参与魏玛会议，一定是个好兆头。

您忠诚的

弗洛伊德

更加深刻了，也看清了导致贝瑞无法前进的阻碍。如果我可以跨越这些阻碍，成果便会泉涌而出。”

还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魏玛大会和她访问维也纳之间的这段时期，卡尔·亚伯拉罕于1912年4月28日致信弗洛伊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魏玛大会上的一位客人，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夫人，已经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和她很熟了，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人，像她这样对精神分析学有如此深刻、如此微妙的理解。她会在今年冬天去维也纳，乐于参加一些讨论会。”

1911年，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开始学习精神分析，时年五十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魏玛大会召开时，弗洛伊德五十五岁。自1902年起，他就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病理学副教授。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作中，他已经解释了情绪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在意识与潜意识中意动的区别，并从使用催眠术的“宣泄”疗法向真正的精神分析疗法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他参考了心理学在所谓神经衰弱方面的研究。“压抑理论成为搞清神经症的基础。”他发现了幼儿性欲的不同阶段，将性欲本能的能量命名为力比多（这一概念的含义在日后愈加宽泛深刻）。他用了多年时间，进行独一无二的自我分析，并于1900年将成果发表，这就是他的基础作品《梦的解析》。在这之前几年，就已经有一些学生加入了他的行列。1908年的复活节，第一届精神分析学大会在萨尔茨堡召开；1910年，第二届大会在纽伦堡召开，会上“国际精神分析学联合会”成立。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没能在历史上成果最为繁盛的时期加入精神分析运动。那时，基础理论已经发表，对弗洛伊德理论真实性的阐明讨论也在进行中。阿尔弗莱德·阿德勒已成立了他的“自由精神分析联合会”，C.G.荣格也表现出了背离的迹象。

① 收到弗洛伊德的肯定答复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她的年轻好友艾伦·德尔普（Ellen Delp）的陪伴下，启程前往维也纳——正如她在《回顾我的一生》所谓“在初步自学了六个月后”——并从1912年10月25日一直住到1913年4月6日，也就是整个冬季学期。每个周六的8点至9点，她都“在私人的安排下”，去参加弗洛伊德在精神病诊所的教室里举行的讲座课程《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章节》，并参与了周三晚间讨论会。该讨论会始于1902年，也被称为“心理学周三协会”。

(维也纳) 11 月 3 日, 1912 年

尊敬的教授:

在星期三晚间的讨论会^①上, 您曾问我是否知道 A. 阿德勒的书。我想在这个话题方面和您多说两句, 让您了解, 他的作品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启发了我, 并确立了我现在所做的一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在精神分析领域内, 但在过去我也十分投入^②。现在, 阿德勒博士邀请我参加他在周四晚间的讨论会。我还没有接受他的邀请, 因为我急需时间来消化吸收前一天从您那里收获感想。在我参加讨论会前, 我想告诉您, 在我的维也纳之行中, 这种感想贯穿着一切——即使是那些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也正因此, 才促使我毅然决然地确定了这次行程。

不胜感激!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11 月 4 日, 1912 年

维也纳 IX, 波加斯 19 号

尊敬的安德烈亚斯夫人:

您对精神分析学感兴趣, 我们十分欢迎。您在观察报告中所表现出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让我们圈中所有人都感到满意。我想现在通知您, 《意象》

① 弗洛伊德、保罗·费德思和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三人就“阿德勒的儿童自卑心理理论”的讨论。(《弗洛伊德日记》, 1912 年 10 月 30 日)“阿德勒的书”指的是他的主要作品《神经症的构成》, 这本书已经于本年出版。阿尔弗莱德·阿德勒于 7 月 1 日将这部作品和的一封信一起寄给了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信件内容收录在《弗洛伊德日记》的注释中。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曾经向阿德勒索要一些导论性文献。

② 在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专心于精神分析学之前所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为 1910 年完成的《成年人》, 曾于马丁·布伯的社会心理学专论丛书系列中出版。那篇未发表的长论文《上帝》也是创作于同一时期。

(Imago)^①的编辑有意图向您约稿，题材最好是关于精神分析与女性内心世界的关系的，这也正是您的兴趣所在。

既然您向我表露了参加阿德勒的晚间讨论会^②的意图，那么我想自作主张给您提个醒儿，这样您也可以对这些烦人的事情心中有数。两个讨论组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是有分歧的。他们常常在精神分析之外，搞些其他的勾当。我们只好被迫断绝和阿德勒分组的一些联系，甚至我们的医学嘉宾也被要求在两个小组中二选其一。这是件很不愉快的事，但他们个人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的组员没有选择。

尊敬的女士，我绝不是妄图限制您。请您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就好像您处于一种人工状态下的人格分裂状态——在您与他们会面时不要透露您与我们的关系，反之亦然。我很抱歉，让您知道了我们的运动背后那些丑事。

希望某天，我可以有机会和您单独谈谈。

真诚致意！

弗洛伊德

(维也纳，11月9日，1912年)

尊敬的教授：

在您的信中，您好心地提及是否有私下会谈的可能。我常常迫切地想要把经过反复研究之后我在某些问题上得到的想法告诉您。如果我的思路足够清晰，也许我可以在信中向您表述一些。请允许我随意从一个话题入手，试着将我的想法付诸文字。

① 杂志《意象》得名于卡尔斯·皮特勒的同名小说。魏玛大会之后，该杂志作为“精神分析学在精神科学中的应用类杂志”创刊。

② 阿德勒的晚间讨论会在每周四举办。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与阿德勒及其理论的关系可以参阅她的《弗洛伊德日记》。

在上次的晚间讨论会，离开时，您曾和费德恩博士^①展开了辩论，就是关于身体残疾的孩子常常认为自己是正常的，而有神经症倾向的孩子，即使身体健康、四肢健全，仍会认为自己有缺陷。在这一问题上，费德恩博士或多或少倾向于支持阿德勒所提出的不同意见，那就是自卑情结的产生常常源于机体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这种心理转化成为嫉妒、仇恨，以及一种膨胀夸大的理想自我。

而在我看来，正好相反。最初的反应应该是对保护的强烈需求，而且离群的欲望降低；只有在所有现实发生的和假想的侮辱出现后，以及在博得怜悯同情遭到拒绝后，自我意识加剧才会接踵而至，导致了抑制最宽泛意义上的（借用您的话说）性需求。

在阿德勒的理论中（他认为这不仅是生理上状态的问题，也是精神层面上的问题。这是纯粹的环境理论），这种自身压抑的需求也会表现出来，因为——在我看来——这正是他所谓的“次级的”、进一步的“防御”。起初针对自卑心理所建立起的防御则是补偿性的、夸大的自我观念，在之后的防御及其为防止自卑感复发所设立的预防措施，发挥妥协作用的原始本能意识会悄悄回归。当然，最终结果是阳刚且永恒不变的，而这些手段却是阴柔女性化的；在目光短浅的观察者眼中，这些现象都是独立而毫无关联的。但问题就是，将其看做纯粹方式的构想是否同样肤浅，它们是否不止是伪装，而且是伪装出的伪装，换句话说，虽然自我观念认为，是利用其象征目的，但事实上，为了达到其目的，并没有将自我观念作为形象和比喻来利用。

我发现，阿德勒对性需求的象征性解释十分令人信服。假如将其理解为一种相互的过程，换言之，就是以性的角度出发和自我观念的角度出发

① 晚间讨论会就是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于11月3日信中提及的那个。保罗·费德恩（1872—1950），维也纳的一名医生，是弗洛伊德最早的一批追随者之一，于1903年执业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日记》也在10月30日提及了费德恩支持阿德勒的偏离观点。

经历同样的过程，那么，我们在象征元素的协助下，不断地在两方面建立我们的人格——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从我们无意识的根源涌出的。在我看来，我们通常所称的“常态”即是双方面的象征意义互相协助、彼此受益的生理过程，而病态就是它们互相干扰，彼此滥用。所以，我很高兴听您最近提起（在您的课堂讨论后，您说过几句话）^① 您最近研究的课题就是性和自我本能的冲突。您之前的理论构想也与此有关，但似乎最终的强调点都落在性元素上。而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压抑”，也就是强调抑制的因素，进而强调冲突本身。只是由于原本的调查结果主要依据的是歇斯底里症的研究，所讨论的临床现象完全由性行为的替代形式主导。我们当然可以说在这种临床现象中，抑制都是不成功的，无论表现形式如何扭曲，性欲望总是占据上风。

而在另一方面，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案例中，抑制表现得更为明显，爱与恨互相冲突，两者交替占据上风。真实的精神病症“自我型神经官能症”只能被理解为自我相对地战胜了性欲；妄想症患者的自我仍然与外界保持着关系，即便是一种仇恨和仇恨恐惧的关系；而在痴呆症患者中，冲突则完全没有了，可以通过同情来构建的桥梁已经断裂了。性行为虽然仍旧发生，却只限于对其自身，虽然这种退行到幼稚的自我性行为形式，与在孩子身上发生的作用几乎相反。因为尚未获得自身主体的所有权是一回事，之后剥夺其客体又是另外一回事，两者间有着鲜明的区别。

我想，在对比病态孤僻症患者与“原始”人类时，我们应该多加谨慎，虽然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产生相似的想法。前者是在内心崩溃状态下产生这种想法的，而对原始人类而言，虽然他们的逻辑更为混乱、可塑性更强，

① 在《弗洛伊德日记》中，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写道：“在讨论会过程中，我们心平气和地谈到了很多事。我很惊讶地看到弗洛伊德是多么坚决地认定他的一个观点，那就是‘神经症是一种力比多和自我之间的混乱，而不仅仅是力比多的问题’。在我提到这与他之前作品中的观点不符时，他说：‘是我最近的设想’。”